

神游于历史与现实之间

陈明光

一、史学本体的不确定性与“神游于历史与现实之间”

什么是历史学？学习、研究历史有什么用？这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问题。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经历了与现实政治攀援附势成为“显学”，到被“边缘化”的过程，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引起急功近利、浮躁风气弥漫的近二十多年间，曾一度倍受冷落。但是，历史又是人们“欲罢不能”的文化，不管是从文明传承的文化角度，还是从“古为今用”的实用角度来看，历史常常不知不觉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举止；历史又仿佛是一盘大杂烩，文人墨客们热衷于下箸其间，这只要看看近些年出了多少历史题材的小说、电影、电视连续剧，就足以证实。

所以，不管历史学的地位如何浮沉，学者文人和凡夫俗子总在自觉不自觉地“神游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换句话说，历史学其实是一座门户开放的殿堂，大家是可以自由出入的。

这是为什么呢？从学科内容来说，实证与阐释，或者说考据与义理，本是历史学不可或缺的两个部分。实证，是搞清历史事实“是什么”，阐释，是说明历史事实是“为什么”。然而，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本质区别，在于其本体的不确定性，就是说，绝对真实、纯粹客观的历史是无法企求的。一方面，从研究客体来看，消逝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复原，后人只能根据遗存的史料进行思考和研究。而遗存的史料传递的信息具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它们渗杂着大量当事人和记录者的主观成分，很难是纯粹客观的。例如，二十五史中有新旧两部《唐书》，对读之下可以发现，许多皇帝诏令、大臣奏章的文句在欧阳修的《新唐书》中被修改了，欧阳修是出于古文学家的审美观而作出的文句修改，但其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违背原意的“硬伤”。试问，若要论“原始史料”，《新唐书》比起《旧唐书》谁更“原始”？进一步说，《旧唐书》的资料就“原始”、“客观”吗？这部书的资料来源即使是取自皇帝活动的《实录》、《起居注》之类，也仍然是当朝史官作了选择之后的记载，挟杂着他们的主观意识（如政治观念、人生价值观等）。可见历史资料的客观性、真实性只能是相对的，局限性很大。另一方面，任何人在读史、治史时都有不可避免的主体性。就是说，人们总是根据自己已经具有的价值观、人生经验、知识素养去剪裁史料、解读史实、解释历史。这就使历史既具有专业性，又有大众性。也就是说，历史不是史学家的禁脔，而是文学家、政治家乃至民间大众都可以分享、利用的文化资源。由此，就发生了你我怎样去认识和解释历史，如何享受“神游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快乐等问题。这是我今天选择这个题目演讲的一个考虑。

历史与现实是什么样的关系？对此中外论者夥矣。例如，1918 年李大钊说：“我以为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过去与未来皆是现在”，“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①法国年鉴学

^① 《“今”》，《新青年》第 4 卷第 4 号。

派的创始人之一布洛赫认为：“古与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①可知，历史与现实有着天然的、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人在阅读、欣赏历史作品或者研究历史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神游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感受，但是，对于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目的，他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会有不同的方式，得到不同的结果。这是值得关注的，因此成为我今天选择这一题目演讲的第二个考虑。

下面我以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为例作些说明。

二、“失(添)事求似”

——文学家的“神游于历史与现实之间”

1、“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历史真实”与“现实关怀”的关系

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古已有之，对其中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之评议，也早已有之。以白居易著名的《长恨歌》为例。对于《长恨歌》涉及的史实真伪，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有精细的考辨，比如，诗云：“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陈寅恪先生指出这里有二个问题：一是时间，七月间唐玄宗和杨贵妃不可能在骊山泡温泉（两《唐书》可证，均在冬季春初寒冷之时）；二是空间，长生殿在唐朝是祭祀祀天神的斋殿，不是寝殿，岂容唐玄宗与杨贵妃夜半在此曲叙儿女私情？我们还可以提出第三个问题：既是“夜半无人”两人“私语”，没有史官在旁边记《起居注》，怎么他俩的山盟海誓会被白居易晓得？然而，对于这种史实考证或者批评，若起白居易于地下，我敢肯定他作为文学家是绝不会听从的。因为，他自己说过：“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已经把《长恨歌》的主题界定为爱情浪漫曲，而把《秦中吟》一类的新乐府界定为政治讽刺诗。这就是说，《长恨歌》尽管在一些细节上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但并不因此损害它创造出的艺术形象，减少它的艺术魅力。

但是，这不等于说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就可以漠然视之，或者为所欲为。大家知道，自古以来，民间老百姓的历史知识，很大部分是从各种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学来的，并且往往以为是信史。可以说，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在文化教育不普及的时代，对于宣传历史知识具有举足轻重的功能。所以，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仅仅从传播文化知识的角度来看，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事关重大。

不仅如此，还存在着历史真实与现实关怀的关系问题。从古至今，凡是杰出或者是一时反响巨大的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都贯穿着强烈的作家主体意识诉求和现实关怀。这方面的例证很多，如西汉“昭君出塞”的历史故事，就被文人演绎出奸邪陷害忠良（见东晋人葛洪撰《西京杂记》）、爱国主义（见元人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民族和睦（如曹禺的话剧《王昭君》）等不同的主题与版本。在新中国，1960年，身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历史学家吴晗多次说：“我不懂戏，也不大看戏，特别是京戏。”“对京戏是个道地的外行。”然而恰恰又是他出于强烈的现实关怀，写出后来招致灭身之灾的京剧《海瑞罢官》。总之，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往往不是纯文学活动，而是反映作家的现实诉求，反映时代精神，由此才

^① 布洛赫著、张和声等译《历史学家的技艺》，第3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产生“神游于历史与历史之间”如何处理“古为今用”、文学形象与历史真实及现实政治的关系问题。

2、文学家与观众、读者对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应有的态度

“治史”与“治艺”分属不同的学科门类。一般地说，由于“术业有专攻”，从文学家的素养和创作动机来看，他们在处理艺术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的关系时容易发生力不从心或者忽略历史真实的倾向。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业已说明，对于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如何古为今用，郭沫若作为文史兼通的专家在其创作历史剧的实践中尚且有偏颇之处，别的文学家在创作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时，为艺术真实和现实关怀而轻易放弃追求“历史真实”就更不足为奇了。因为，文学家读史的动机，通常是出于为其创作活动寻找素材，或者提供历史背景，其功利性是比较明显的，容易浅尝辄止，或者只求为我所用，不辨真伪。但是，我以为，作为一名对自己的作品怀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应该对作品在历史真实方面应达到什么程度，要努力加以追求，并有清醒的把握。应有谦虚谨慎的态度，不要轻易把自己创作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标榜为信史、“历史正剧”。有的人认为，历史剧要做到“事必有据”，在客观上办不到的，这点我十分赞成，因为史学家也很难真正做到“言必有据”，适当的推论仍是允许的研究方法。但是，如果以此为理由而走向胡编乱写，借用某个历史人物的名字，虚构一段纯粹子虚乌有的故事，又标榜为“历史正剧”，那不是为历史负责、为文化负责的态度。当然，作家不是历史教师，不以直接传播历史知识为本职，但是，无论是谁也没有权利传播错误的“历史知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专门话题，可以讨论许多生动的个案，在这里我只是强调作家应有的责任感。

事实上，有些著名学者和作家对于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辩证关系，已经做出规律性的总结。如郭沫若就从自己创作历史剧的体会中概括出“失事求似”或者“添事求似”的创作原则，主张细节可以虚构，但所反映的历史人物的基本面貌、历史事件的基本趋势应该是客观真实的。吴晗认为：**如果要严格地写历史戏，就不能不受历史的约束……写历史的人，不能用百分之百的真实去要求艺术，但艺术所反映的历史基本事实，总要和客观存在的史实差不多。**^①茅盾指出，历史剧不等于历史书，因而历史剧中一切的人和事，不一定都要有牢靠的历史根据；但要求凡属于历史重大事件基本上能保存其原来的真相，凡属历史上真有的人物，大都能在不改变其本来面目的条件下进行艺术加工，不能对历史事实任意斩割装配，乃致改头换面。^②我认为，严肃的作家在创作历史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时，应该朝着这种方向努力。

同时，我也主张史学家或者观众也犯不着为“历史剧偶尔出现的一些常识性错误”与作家打笔墨官司。史学家对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要持一定的宽容态度，对作家追求“传神”、追求艺术的真实要加以理解，要从大处着眼，不要抓住枝节问题而加以全盘否定。从阐释历史这一追求来看，作家的艺术阐释与史学的学理阐释有相通之处，要求同存异，不宜彼此排斥或厚此薄彼。

作为观众、读者对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则要有清醒的定位，切不可将“戏说”、“演义”作“信史”。

三、“以史为镜”

^① 吴晗：《》，载《灯下集》……

^② 茅盾《关于历史和历史剧》

——政治家的“神游于历史与现实之间”

自古以来，政治家读史，是要为其实践政治思想、推行政治主张、作出决策提供历史依据。通常的情况，政治家往往是从现实出发去寻找历史，古人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无疑带着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或者政治功利性。

这里大略地谈一谈毛泽东读史、用史的“古为今用”原则及其影响。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历史知识渊博，善于神游于历史与现实之间。作为一名革命家、政治家，他的读史是为了古为今用，历史只是工具、手段，他的读史是要为现实需要服务的目的十分强烈。他明白地说：“向古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活人。”建议大家去读一读张贻玖写的《毛泽东读史》一书（中国友谊出版社1991年版）。

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毛泽东的“神游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其实可以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历史知识的学习和运用。在这一层次上，他的读史旨趣与平常人有相似之处，不过，作为一名雄才大略、高瞻远瞩的革命家、政治家，他所关注、所运用的历史知识又与常人颇多不同。从《毛泽东读史》一书所提供的材料来看，他读史的重点在于政治史和军事史。他批注的史书篇目不多，所批注的历史人物多是皇帝、政论家、辅佐大臣、军事家；所批注、引申的历史事件多是政治事件、农民战争以及著名的战例。第二个层次属于史学问题的个人见解，如中国古代何时进入封建社会、《红楼梦》的社会背景等。这些见解无非是一家之言，本来是可以开展学术讨论的。第三个层次属于思辨的历史哲学，即对人类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见解。毛泽东在历史哲学方面的论断，主要是运用历史唯物论探讨历史发展趋势以及对历史发展动力的论述。他的这些见解，对于指导近现代中国革命影响深远。不难发现，毛泽东和其他杰出的政治家尤其是改革家一样，他们阐释历史的思维特点，是从现实出发去神游历史。他们读史往往喜欢类比，或者以历史类比现实，或者以现实类比历史。但是，必须注意到，他们“神游”所得，其实是有不同层次的区分。

我认为，认识并区别对待毛泽东“神游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三个不同层次是很重要的。可惜的是，以往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出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人们往往把毛泽东的读史心得与其历史观、历史哲学混同看待，把学术见解与政治态度混同起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的若干热点即所谓史学“五朵金花”，其中古史分期、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三个大问题，都与论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直接联系起来，这固然与毛泽东的读史兴趣和鼓励、推动有关，也与人们不能正确对毛泽东的具体史学论断有关。

不难理解，政治家往往希望史学阐述服从于现实需要，愿意看到历史研究成为诠释现实政治的合理性的有效工具。毛泽东对某些历史问题的个人论断之所以成为新中国史学的主流意识，是新中国以来史学研究被意识形态化的明显表现。历史已经证明，这绝非正常的学术现象，应该引以为戒。今日，历史研究怎样做才算是为现实服务，仍然是政治家和史学家都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四、求真、致用

——史学家的“神游于历史与现实之间”

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求真与致用都是传统。但是，在实践中，因现实政治的干预，求真与致用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中国古代历史学者从事修史、治史

工作，很早就被纳入政治管理体制，“史官”、“史臣”的设置即为鲜明表现。

“史官”是纳入政治体制的历史学者，在唐朝进一步制度化了。他们往往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身为学者，他们的职责包括“求真”，要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甚至不惜为此冒犯君王，丢掉官职直至生命。另一方面作为官僚，他们更要注意发挥“致用”功能。司马迁自述写《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追求的也是“求真”与“致用”的完美结合。在中国古代，史官履行其“致用”功能要强于“求真”职责。相对而言，“史家”没有官方身份，学术自由度相对较高，“求真”的价值取向更强烈。但是，由于“致用”一直是中国士人的理想追求，只满足于“求真”而不问政治的“史家”是很少的。南宋的民间史学家郑樵潜心山林撰著《通志》几十年，最后还是提着自己的书千里迢迢找皇帝要求“致用”去了。

到了中国近现代，史学的致用功能继续被突显。新中国建立后，“古为今用”更是被官方史学确定为治史宗旨。正象前面所说的，政治家“神游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往往是从现实出发，追溯历史过程，期盼历史研究能直接解答现实的问题。然而，历史研究是一个从过去到现在的推演过程，它讲究事物发展的前后关联性但未必一定是前因后果，直接联系，也就是说，史学研究与现实问题的联系本来应该是间接的，不能象照镜子那样直观。

历史究竟能为现实政治提供多少直接的现成的经验教训？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曾经说过一段令人丧气的话，他说：“人们习惯于把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介绍给各个君主、各个政治家、各个民族国家。但是，经验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政府和各民族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这话虽然偏激，却不乏事实根据。所以，作为史学家，不要对自己作品的现实作用抱有不切实际的奢望。试问，近些年来，历史学者写了那么多的反腐倡廉的作品，事实上对于今日的贪官有多少事前的警示作用？同样的，现有不少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活动每每要求历史研究成果要有现实意义，也是强人所难，并不合理。

那么，作为史学家，“神游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如何处理学术与现实的关系？我想，首先，历史学者的学术思辨、研究选题应该密切关注现实需要。“致用”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功能之一，在 21 世纪仍将是现实社会对历史学者的殷殷期望。当然，今天的“致用”不能仅仅局限在为政治服务，而要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文明建设服务。如果史学家因为鉴于过去与现实政治联姻之弊而逃避现实，再次躲进“象牙塔”，结果必然是丢失史学的宽广社会基础，窒息史学的生命力。其次，关注现实，可以产生反思历史的灵感。也就是说，现实生活可以为史学家研究历史提供许多新鲜的思路。例如，如何恰当地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商人、牙人（买卖中介人）等社会阶层的经济作用？我觉得可以从当今市场经济的现实活动获取启迪。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贱商、抑商的官方政策和社会风气，在官私文献中，商人、牙人等多被描绘成“奸诈之徒”、“兼并之家”、“为富不仁”等形象。我国在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时期，史学家对中国历史上商人、牙人的经济作用的关注点及总体评价贬抑甚多，与古人大同小异。然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活生生的经济现实使人们重新认识到，在商品交换、商品供求过程中，交易成本的存在及其必要性，市场信息不对称与交易费用高低的关系等市场经济活动规律，从而对当今商人、经纪人的正当活动给予积极评价和政策鼓励。这对我们反思历史上商人、牙人活动的正当性颇有启发。以往对历史上牙人的研究和评价有失偏颇，过多地描述、抨击他们的欺诈行为，而对他们在市场交易活动中所发挥的沟通买卖、评议交易价格、担保交易信用等积极作用缺乏

足够的研究和应有的评价。所以，关注现实即使对于学术研究活动也是颇有意义的。

总起来说，历史仿佛一座不收门票、门户开放的智慧之宫，任人游览；历史与现实如影随形，无处不在。“神游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是大众皆可获得的欢愉。刘勰《文心雕龙》称：“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当人们读史、用史，神游于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时候，“思理”即阐释历史最为关键。

不过，究竟怎样才能获得“思理”之妙，对于文学家、政治家、史学家，对于你我他，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今天我所说的，无非是一己之见，仅供参考。

（演讲于 2002 年 11 月 1 日晚上，地点：厦门大学嘉庚 5 号楼。

载《潮声——厦门大学人文讲演录》，黄山书社，2003 年）